

太平天国人物论集

苏双碧 著

太平天国人物论集

苏双碧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太平天国人物论集

苏双碧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5印张 166千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750

书号: 11173·34 定价: 0.65元



前 言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代。鸦片战争前，中国已经出现许多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手工工场和大规模的开采业、运输业等等。鸦片战争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资本势力日益侵入。国内缓慢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和产品的传入，两者交相作用，冲击着旧的封建经济。因此，这个时代尽管旧的封建生产方式仍然占统治地位，但已经在瓦解和崩溃之中。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爆发的近代中国、近代亚洲最大的农民战争，就必然要打破以往所有农民战争的模式而赋有新的时代的特点。太平天国的立国纲领、政权形式，以及它所实行的实际政策，都和以往的农民战争政权有着新的根本性的区别。所有这些，都是太平天国革命高于以往一切农民战争的标志。

对太平天国历史人物作出评价，首先是把这些历史人物放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进行考察。在这个集子里，我对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洪仁玕等八个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和论述。在论述中，注意联系这些历史人物的时代特点。他们的思想不是整齐划一的，新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因素和旧的封建传统思想，对他们都同时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并制约着他们的行为。因此，表现在他们身上的，往往是新旧两种思想兼而有之：首举反孔的旗帜，但却摆脱不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提倡平等思想，主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

是姊妹之群”，却又建立诸如回避、敬避字样以及宝塔式的一整套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一方面提出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一方面又重新颁布反映农民小私有者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天朝田亩制度》。这些自相矛盾的思想主张，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即新的思想因素要突破旧的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旧的传统观念尽管还顽固地存在着，却已经固守不住原先那种单一的封建观念。当然，我们这里说新的资本主义因素还是比较微弱的，但它却是存在的。所有这些，用“单纯的”、“旧式的”农民战争是难于概括的，概括了也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但是，如果多走一步，把他们所具有的新的思想因素，说成是全新的资本主义思想因素，也不是历史事实。我们在对上述历史人物的评价中，特别是对洪秀全、洪仁玕的评价，曾经力图反映出他们的时代特点，对他们的功绩和过错采取实事求是的评价。由于水平所限，在研究中不免有片面性和错误之处，这些都有待于同志们教正。

在十年动乱前，笔者曾对太平天国的一些历史人物进行过评价，十年动乱之后，又陆续发表过一些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学术文章。在出版这个集子前，对上述有关文章作了重新订正和改写。几年来由于较多地考虑了这些历史人物各自的特点和功过，并把他们的历史表现作了一些比较。因此，在改写和订正已经发表的一些文章中，除了文字和材料的订正外，有些观点也作了修正。

上述八个历史人物，基本上是太平天国前期和后期最主要的人物，首义诸王写了五篇，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写了三篇。在首义诸王中，洪秀全是贯穿两个时期的核心人物，太平天国运动和洪秀全从国外引进独一真神皇上帝有直

接关系。但最先直接用宗教外衣组织群众，准备起义的却是冯云山而不是洪秀全。所以，我们把一八四七年前洪秀全所从事的努力，称之为叉道上的改良。石达开出走后，基本上和太平天国没有关系，他的后期实际上是另作别论的，我在评述中，指出了石达开的过错不在于出走本身，而在于出走之后，所实行的错误策略，这是铸成石达开历史悲剧的原因。其他三个首义诸王中，对杨秀清和冯云山的历史功绩都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对韦昌辉，我不赞成替他翻案，更不赞成韦昌辉是什么“功大于过”，但我认为对韦昌辉应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肯定他前期应有的历史功绩，揭露其地主阶级“阴忍残刻”的本质。后期太平天国的三个首要人物中，陈玉成的事迹比较单纯，他是以杰出的军事将领的面貌出现在太平天国历史舞台的；李秀成这个人物比较复杂，他为后期太平天国建立功勋，同时也暴露了他思想中的许多消极因素，是一个功绩和过错都相当突出的人物；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历史人物中，思想境界最高，他的《资政新篇》反映了时代的方向和脉络，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八个历史人物来加以论述，是因为这些历史人物基本上主宰了整个太平天国的历史，认真对他们进行研究和探讨，对深入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是有好处的。同时也因为，这八个历史人物，除了陈玉成之外，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借此可以发表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由于这些历史人物大多活动于相同的时代，材料和论述都不免有些重复，在论述时，虽然尽量避免，但个别地方实在避免不了，也就只好让它重复了。

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我是后辈，资料和学识都很不够，出版这个集子，目的是为了和同志们交流一些学术观点，更

好地接受史学界同志和读者的教正。集子内中错误之处，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作 者

一九八〇年九月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论洪秀全.....	(1)
关于杨秀清评价的几个问题.....	(33)
论太平天国运动的奠基人冯云山.....	(72)
评韦昌辉.....	(97)
论石达开.....	(120)
论杰出的青年将领陈玉成.....	(146)
论李秀成的功与过.....	(166)
论洪仁玕及其新政.....	(200)

论 洪 秀 全

在太平天国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洪秀全是一个最关键的人物，他的思想、行为和太平天国的发展、衰败息息相关。作为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爆发在中国资本主义因素正在增长而封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开始深入中国之时，这就决定了洪秀全领导的这场革命运动，不会是也不可能是一场“单纯的”或“旧式的”农民战争。历史事实表明，洪秀全不论是引进了“独一真神皇上帝”，还是提出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都是旧式农民战争所未曾有过的，至于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更是一个明确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更不是什么“旧式”农民战争所能达到的。正是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决定了洪秀全身上新旧思想的矛盾相当突出。因此，对洪秀全新旧两种思想的考察，阐明它们对太平天国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评价洪秀全时必然要触及到的根本问题。本文想着重对洪秀全的思想和太平天国的纲领进行一些分析，并结合当时的实际，对洪秀全作出评价。

又 道 上 的 改 良 思 想 药 方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新旧思想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互相交织、互相矛盾和互相冲击，决定

了洪秀全对待周围事物的看法，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因袭封建社会的旧观念，这也就决定着这个近代史上的杰出农民领袖有着独特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可以肯定地说，他从事政治活动是从他接触外国传入的早期基督教的教义开始的，但他又没有被束缚在那“劝人为善”的教义上，而是从一开始就想接过这个外来的宗教，对腐败的中国社会进行改造，尽管这个改造本身的方向是不明确的，而且可以说，是在叉道上的一种改良思想，但他毕竟是从通过科考一举成名的幻想中向前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洪秀全是封建社会的乡村知识分子，“自幼即好学，七龄入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读书未几即得其业师及家族之称许。其才学之优俊如此。”^①显然，这是一个天才而有抱负的人。由于封建思想的熏陶，洪秀全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下层知识分子一样，一心想走封建统治阶级的士阶道路，希图通过科举途径“一举成名”，跻身于封建社会上层。他从十六岁起就到广州赴科考，之后又多次赴考。据说每次都是“名列前茅”，但每次都是“落第而归”。考场的失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使他失望，封建官场这块诱饵，强有力地吸引着他。留恋不舍、发奋读书、失败了再考，这是他挣扎和奋斗的目标。

但是，历史的进程，总是要对人们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总是要迫使某些历史人物不得不改变原先划定的航向。洪秀全醉心于科考时，中国的社会已是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和白银的大量外流，外国资本主义兵舰炮击广州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鸦片战争爆发，三元里人民声势浩

^①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38页。

大的抗英斗争，《南京条约》签定，这些急剧的社会变迁，对距离广州只有百里之遥的花县，必然要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洪秀全在激烈震荡的一八三六年到一八四三年七年中，先后四次到广州赴考，但考场上的失败和新形势的冲击，势必动摇了他一心想向封建官场里钻的信念。

洪秀全科场成名的幻想彻底破灭之后，时代的变幻风云便会成为激发洪秀全寻找新的出路的根据和动力。一八四三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考落第，使他完全失去仕宦的信心。他熟读孔孟之书，却长期被排斥在官场之外。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屡试不第，不是因为自己学问不足，而是因为清朝官场的腐败。仕途的破产，使洪秀全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对曾经使他陶醉过的孔教儒学也开始怀疑了。七年前，即一八三六年，他在广州得到《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时，诚然是毫不在意的，他不但当时没有看，后来也把它撇在一边。最后一次科举失败之后，在仕途绝望的情况下，洪秀全的亲戚李敬芳告诉他，“此书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这才引起洪秀全的注意，而“潜心细读之，遂大觉大悟。”^①饱尝儒学的洪秀全，对于西方基督教的一些教义，自然是感到奇特和新鲜的。况且，梁发的《劝世良言》的一些内容，也深深打动了洪秀全的深处心灵。例如其中写道：“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文昌、魁星）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吗？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②这些话自然有

①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6页。

② 《劝世良言》卷一。

力地击中了洪秀全的痛处，连续的考场失败，使他很容易接受《劝世良言》的说教。文昌、魁星既然帮不了洪秀全成名，洪秀全便有理由搬掉文昌、魁星，转而相信天父皇上帝了。他很快地接受了《劝世良言》的说教，只要敬拜独一真神皇上帝，便可以走上幸福的道路，中国便可以有望。他也想通过拜上帝劝人为善，改变“人心浇薄”的恶习，扭转“世道乖漓”的局面，等等，一言以蔽之，想通过组织拜上帝会对中国社会风尚和道德进行改良。

《劝世良言》使洪秀全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都敬拜上帝，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和超度。《劝世良言》的内容对洪秀全当然谈不上是什么革命思想的启迪，而是使他立志成为一名基督教的信徒。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过去常常把洪秀全拜上帝说成是革命思想的开始，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过，对洪秀全从西方学到拜“独一真神皇上帝”这件事，也不能小视。有人认为是学到了糟粕，有的则认为是当作革命的宗教外衣而引进的。我认为，洪秀全从西方迎来了“独一真神皇上帝”，是需要有很大勇气和魄力的，它的深厚历史根源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崩溃，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的增长。这种新的经济因素不但给洪秀全以动力，也给洪秀全以勇气。他接受异端，竟然敢拿“独一真神皇上帝”和两千多年来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孔教对抗，宣布孔教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可谓有胆有识。尽管这个看法是不确切的，但在一百三十多年前，确实是了不起的创举。不过，洪秀全的举动，仅仅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还谈不上有把这个“皇上帝”当成“农民战争外衣”的想法，他至多只想当一名合格的教徒或传教士，以便通过传教

来改良中国的社会风尚。

洪秀全按照《劝世良言》所规定的程序自行洗礼，“对皇上帝祈祷，许愿不拜事邪神，不行恶事，而恪守天条。彼等于是自己灌水于顶上，自言‘洗除罪恶，去旧从新。’”^①之后，仿照《劝世良言》所谓“我是有罪过之人，若不倚赖耶稣代赎罪之功劳，而我的罪过，怎能求得神天上帝白白赦免乎？”的说教，写了一首诗：“吾侪罪恶实滔天，幸赖耶稣代赎全，勿信邪魔遵圣诫，惟从上帝力心田，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我亦怜，及早回头归正果，免将方寸俗情牵。”^②表明他要做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谈不上有半点革命的思想。当洪秀全决定发展拜上帝会信徒时，又写了一首诗：“神天之外更无神，何教愚顽假作真。只为本心浑失却，焉能超出在凡尘。”^③同样也没有越出《劝世良言》的范围。

但是，大约连洪秀全也没有意识到，当他决定抛弃孔教（虽然还只是形式上的）时，他的行为就已经不仅是单纯的宗教因素了，而是必然要带来政治后果的。既然洪秀全确认“神天之外更无神”，就必然要蔑视其他一切偶像崇拜，这就产生了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将各自所在的“书塾中之偶像尽行除去”，并把“馆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牛猪门户来龙之妖魔”也一律除去，公开向孔教宣战。尽管这种行为只是出于宗教所然，但却和传统的神权相抵触。反对偶像崇拜首先要遭到习惯势力的反对，同时又触犯清王朝的国教。这个举动，不管其程度如何，在冲破旧的封建思想的禁锢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洪秀全初期活动的可贵之处，就是没有被外国那种纯粹是消极的宗教教义牵着鼻子

①、②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7页。

走。从一八四三年到一八四七年，洪秀全对基督教的教义进行了认真的改造，使之更符合中国的国情。他通过对《劝世良言》的改造，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社会进行改良的强烈愿望。他在《原道醒世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当今之世是，“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故以此国而憎彼国，以彼国而憎此国者有之；甚至同国以此省此府此县而憎彼省彼府彼县，以彼省彼府彼县而憎此省此府此县者有之；……世道人心至此，安得不相陵相夺相斗相杀而沦胥以亡乎！”^①这些慷慨激昂的言论表明了他对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愤懑态度，社会已经到了不进行改造就不能前进的地步了。那么，怎样对这个黑暗社会进行改造呢？洪秀全渴望有一个平等的社会，使“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都是平等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彼此之间不存“此疆彼界之私”，不存“尔吞我并之念”^②。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拜上帝，信“独一真神皇上帝”，理由是，皇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代理，远而番国亦然；远而番国是皇上帝生养保佑，近而中国亦然。”^③信皇上帝就能和番国共沾天恩，平等相处。诚然，洪秀全在社会激变的烽火中，除了看到“番国”的鸦片、大炮之外，还看到“番国”是强盛、先进的国家。但是，怎样走“番国”强盛的道路，向“番国”学习，洪秀全这时还缺乏象林则徐那样的社会实践，也没有象魏源那样对外国资本主义世界的了解。因此，他还不能提出“师夷长技”的口号，也不能有后来洪仁玕提出“和番人

① 《原道醒世诏》，《太平天国印书》第391页。

②、③ 《原道醒世诏》，《太平天国印书》第392页。

并雄”的杰出主张。他这时候只是看到了腐败的清王朝必须进行改造，只是看到了“番国”比中国强盛，从而产生了要求中国和“番国”平等，有共同的天父，天下之人都成为皇上帝的“赤子”。而洪秀全找到的救国药方就是敬拜上帝。通过拜上帝，劝人为善来教化中国的民心。这种改良思想其积极意义是淡薄的。他传教五年，所信者无几，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洪秀全既然看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先进和清王朝的腐败，就为洪秀全后来的思想发展，提供了根据和条件。我们之所以把这种改良思想称为叉道上的改良思想，就是因为它不是正道，它还没有涉及对中国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的改良。尽管这种改良思想积极意义并不大，却不能过多地否定它，应该看到，它还有积极的一面。设若没有这种认识，就很难区别于封建顽固派，洪秀全也就不可能成为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

洪秀全革命思想的确立和发展

严格地说，洪秀全的革命思想和行动，从叉道上的改良思想转变成为用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当是产生在冯云山之后，即一八四七年第二次进广西以后。促使其成为革命者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看到贫困山区，竟有如此众多的信徒，大受鼓舞；另一方面，广西各地会党纷纷起义，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在紫荆山地区，以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为主体的拜上帝会和地主武装团练不断发生冲突，拜上帝会会众要求结伙自卫。有名无实的洪秀全既然坐享其成，当了教主，也就必然成为会众对抗清王朝或地主武装的领袖了。紫荆山的群众运动把洪秀全推上了革命的征途，在叉道上辗转

几年的洪秀全从此开始振作，思想为之一变。

那么，史书为什么大量记载了洪秀全在一八三七年后就有许多充满着革命内容的诗句呢？这是必须进行认真考察的一个问题。一八四七年八月，洪秀全来到紫荆山，形势把他推向阶级斗争的前列，成了众望所归的教主。按照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习惯，洪秀全也必须是受命于天的。于是，冯云山、洪仁玕以及洪秀全本人在广东进行了一场紧张的策划，洪秀全“受命于天”的神话就编造出来了。办法就是把洪秀全一八三七年落第之后的大病中的“异梦”作了加工，并赋予新的内容。例如，后来洪仁玕曾经说过，洪秀全在一八三六年病中就作了“手持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的诗句，并说他一八三六年在落第回家的途中就写过“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①洪仁玕在《英杰归真》里更说，洪秀全得病时，就吟出“鸟向晓今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的诗句。这些材料的出现无非是要说明洪秀全早就胸怀大志，具有反抗清王朝的革命思想。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洪秀全正醉心科举，他的全部心血是想挤进官场，绝不会有如此大胆的犯上之言，洪秀全再三赴考的行动本身就是明证。

一八四三年，科考再次失败，当局的腐败日甚一日，洪秀全才决意抛弃科考的仕阶道路。这个转变确实是关键的一环。但是，如果把洪秀全的这个转变，说成是从梁发的《劝世良言》中，接过“皇上帝”来宣传革命，根据也是不足的。梁发的《劝世良言》是一部为剥削阶级辩护的书，根本没有什么“反抗”思想，它要贫者“安贫守分”，“遵守神天上帝之命，安贫乐业”，要世人“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

^①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二册，第848页。

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洪秀全能从这样一本拙劣的、足以消弭人民斗志的书中得到启发而走上革命的道路，那才真正是不可思议的。

至于后来洪秀全当上了拜上帝会这个农民革命团体的教主，完全是意外之事，它并非洪秀全努力实践的结果，而是冯云山把亲自缔造的教主地位留给了洪秀全。紫荆山的形势甚至连洪秀全也十分惊喜，但冯云山既然虚教主位以待之，洪秀全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教主。如果把冯云山的艰苦创业作一简单回顾，洪秀全的教主地位是坐享其成的就更明显了。

早在一八四四年，洪、冯第一次离开家乡传教时，遍游广东十多个县后，来到贵县赐谷村。有人说洪、冯此次来贵县是“选择革命根据地”，有人认为是一次“起义”的活动，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从洪、冯在赐谷村宣传的内容看，其中心只是劝人信“独一真神皇上帝”、“悔过从善”，后由于经济上遇到一些困难，即所谓“表兄家苦”，就知难而退。可见洪秀全当时只是想按照《劝世良言》的规定进行传教，还不具备革命的信念。所以，他公然提出要同行的冯云山等人立即离开贵县，返回广东。

尽管这一主张遭到冯云山的强烈反对，他还是执意要终止在赐谷村的传教活动。实际上，在赐谷村的最后日子里洪、冯的争执，最终是导致他们各自在一段时间里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因此，这次争执的结果是冯云山第二天就离开赐谷村。洪、冯争论的内容是去留问题。从事后的发展趋势看，也证明洪、冯的分歧是在于坚持下去和半途而废两种意见的不同。

冯云山显然有更深沉的考虑，他希望传教活动有更明确的目的性，甚至带有政治色彩。换句话说，他是有深远图谋